



长江三峡工程
文物保护项目

报告

戊种第四号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
考古学文化研究

于孟洲 著

科学出版社



长江三峡工程
文物保护项目
报告

戊种第四号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 考古学文化研究

于孟洲 著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对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遗存的分类与文化归属、分期与年代、分布与文化因素构成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地区夏商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族属等问题。这些研究表明,夏商时期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分布着两类以上的考古学遗存,本书对峡江地区内部各类遗存间以及峡江地区与外部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民族学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 / 于孟洲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7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戊种; 4)

ISBN 978-7-03-028282-8

I. ①峡… II. ①于 III. ①长江流域—中游—夏文化(考古)—研究
②长江流域—中游—商周文化(考古学)—研究 IV. ①K87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2987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王光明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朱光光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A4 (880 × 1230)

201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1/2

印数: 1—1 600 字数: 418 000

定价: 1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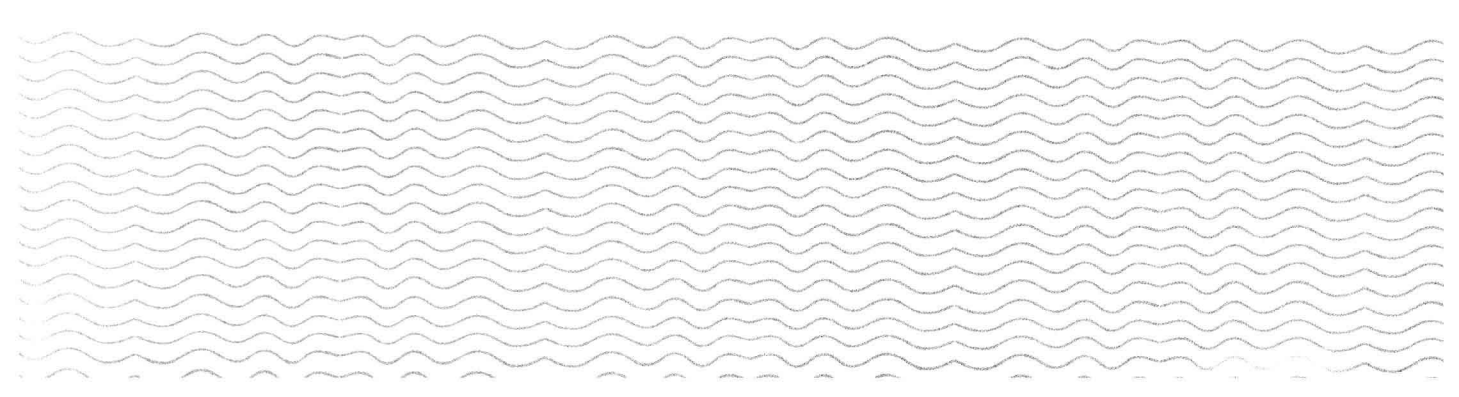
Reports on the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E(monographs) Vol.4



The Research on the Archaeology Cultures of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in Xiajiang Region

Yu MengZhou

Science Press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

湖北库区编委会

主 任 张 通

副主任 杜建国

编 委 张 通 杜建国 汪元良 沈海宁 杨德菊
吴宏堂 黎朝斌 梁今辉 邢 光 王风竹

总 编 沈海宁

副总编 吴宏堂 王风竹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

戊种（研究报告）第四号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

项目承担单位

四川大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本书探讨的空间范围及自然地理概况	(1)
一、本书讨论的空间范围	(1)
二、峡江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1)
三、峡江地区的古环境状况	(2)
第二节 本书探讨的时间范畴	(3)
第三节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简史	(6)
一、早期的调查和发掘(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70年代)	(6)
二、峡江地区先秦时期遗址发掘增多与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建立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期)	(8)
三、峡江地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持续深入阶段(1997年至今)	(12)
第四节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及意义	(14)
一、选取峡江地区作为本书讨论空间范围的目的和意义	(14)
二、选取“夏商时期”作为本书讨论时间范围的目的及意义	(15)
第一章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分类及其文化归属问题	(16)
第一节 “中坝文化”和“白庙文化”时期遗存的分类与文化归属问题	(16)
一、关于“中坝文化”	(16)
二、关于“白庙文化”	(23)
三、关于跳石、魏家梁子、锁龙等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存	(34)
四、关于中堡岛遗址中区⑦层遗存	(36)
第二节 三星堆文化时期遗存群分类与文化归属分析	(37)
一、关于“朝天嘴文化”	(37)
二、关于“中坝子遗存”	(41)
三、楠木园遗存	(45)
四、巫山培石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	(47)
第三节 路家河文化时期遗存分类与文化归属分析	(47)
一、关于“路家河文化”	(47)
二、关于“石地坝文化”	(50)
第四节 余论	(59)
第二章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或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61)
第一节 中坝文化与白庙文化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	(61)
一、中坝文化分期	(61)
二、跳石类遗存分期	(71)
三、白庙文化分期	(77)
四、各类遗存间的年代对应关系讨论	(86)

第二节 朝天嘴文化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	(91)
一、朝天嘴文化分期	(91)
二、中坝子遗存分期	(99)
三、各类遗存间的年代对应关系讨论	(104)
第三节 路家河文化和石地坝文化的分期	(106)
一、路家河文化分期	(106)
二、石地坝文化分期	(132)
三、两支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	(149)
第三章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谱系分析	(154)
第一节 中坝文化阶段	(154)
一、中坝文化	(154)
二、白庙文化	(156)
三、跳石类遗存	(162)
四、中堡岛⑦层遗存	(164)
五、相关问题讨论	(165)
第二节 朝天嘴文化阶段	(166)
一、朝天嘴文化	(167)
二、中坝子遗存	(171)
三、楠木园遗存	(173)
四、培石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	(174)
五、相关问题讨论	(175)
第三节 路家河文化和石地坝文化阶段	(176)
一、路家河文化	(177)
二、石地坝文化	(180)
三、相关问题讨论	(183)
第四节 小结	(185)
第四章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形态与族属	(187)
第一节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渔猎经济与农业经济	(187)
一、渔猎经济	(187)
二、农业经济	(189)
第二节 关于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	(192)
一、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	(193)
二、相关问题探讨	(199)
第五章 结语	(203)
第一节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变迁的特点	(203)
第二节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207)
参考文献	(211)
Abstract	(216)
后记	(223)

绪 论

第一节 本书探讨的空间范围及自然地理概况

一、本书讨论的空间范围

在地理学上,“川江在奉节到宜昌段以峡谷栉比而闻名,故又有峡江之称”^①。

在考古学上,“峡江地区”这一名词却多被用于指重庆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地区^②。行政区划主要包括现今重庆市的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及湖北的巴东、秭归、宜昌等县市(区)的长江沿岸以及这一区域各支流的沿岸地带。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虽主要讨论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但在有的时段由于某类遗存的分布范围已超出这一区域,我们也会加以讨论。举例来说,三星堆文化时期,宜都毛溪套遗址的文化面貌与西陵峡地区相似,而至路家河文化阶段,清江流域的香炉石等遗址又表现出与鄂西峡江地区文化面貌的较大一致性,所以我们会在叙述这两个时段的考古学文化时一并讨论。

也可以这样说,本书讨论的地域指代的是一个变动的地理范围,在不同阶段所指范围可能会稍有不同。但在不同时段,“峡江地区”均为本书讨论的中心区域。

二、峡江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本书所讨论的峡江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正处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的过渡带上。

据地理情况的不同,这一地区可划分为两部分:东为大巴山—巫山山区,西为川东平行岭谷区。其中,东面的大巴山—巫山山区主要包括巫山、巫溪的一部分和秭归、兴山、宜昌等地。这一地区出露地层以石灰岩和紫色的砂页岩为主,宜昌、秭归一带还有部分花岗岩。山体是在地质新构造过程中经长期间隙性差异抬升及强烈的侵蚀溶蚀作用下形成的,故地势陡峭、岩溶发育、沟谷密布、峡谷幽深,著名的长江三峡就位于此区域。其中三峡库区最低处——三斗坪的海拔仅为66米,而这一地区一般山岭的高度都在海拔1000米以上,还有不少山岭的高度在海拔1500米以上,故而形成群山峦起、高低参差、复杂多变的地形^③。西面的川东平行岭谷区属四川盆地。四川盆地是地形上的一个完整盆地,四周均为海拔2000~3000米的高山和高原:北面是大巴山、龙门山;西面是青藏高原边缘的邛崃山、大凉山;南面是大娄山;东面是巫山,这些山脉形成四川盆地的天然边界,而盆地本身则为海拔300~700米的丘陵和平原^④。此盆地由三个不同的地貌区组成,即:盆东平行岭

① 郑霖:“川江”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62页。

② 如孙华在《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一文中界定的峡江地区范围为“四川盆地东部西陵峡以西、重庆以东的沿长江地区。……该地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讲属于四川盆地东部的盆东平行谷地,它与盆西平原和川中丘陵构成了四川盆地内的三个主要地理区域”。详见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116页。

③ 参照金义兴、陈卓良、郑重、许天全:《长江三峡库区植被及环境考古报告》,《武汉植物学研究》1984年第2卷增刊,5页。

④ 参考任美镔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修订第三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226~231页。

谷区、盆中方山丘陵区、成都平原区。其中,盆东平行岭谷区即位于四川盆地隆昌—渠江以东,由大小 28 余条北东向平行的褶皱背斜所组成,由于多为箱形褶皱,故山形细长,顶部平坦,两翼陡峻,对称而规则,海拔 700 ~ 1000 米,其中华蓥山最高,主峰海拔达 1433 米。山岭多由中生代灰岩、泥岩、页岩和砂岩所组成,背斜顶部坚硬的砂岩被剥蚀后,下部灰岩出露,经流水侵蚀发育成为槽谷,这样,一条山脊顶部就常常出现二岭一槽或三岭二槽的现象,槽内有小型喀斯特地貌发育,各背斜山岭之间则为向斜谷地,有丘陵和平坝,海拔亦达 300 ~ 500 米^①。这些岭谷内的向斜谷地,是渝东地区农业和人口的中心^②。另外,峡江地区的水系发达,在三峡库区范围内注入长江的有乌江、大宁河、香溪河等共计 124 条大小河流。

在气候方面,峡江地区地处中纬度,为副热带东、西季风环流控制的范围,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一般特征。夏季,西风带逐渐北移到北纬 40 度以北;副热带西太平洋高压,相继移到北纬 30 度附近。由太平洋来的东南季风和由大西洋来的西南季风携带大量的暖湿空气由南而来,与南下的冷空气接触形成锋面天气,使夏季雨量充沛。当锋面停留在长江流域时,便形成峡江地区初夏的雨季和梅雨天气。7 ~ 8 月份,太平洋高压控制川东一带时,便形成连晴高温的伏旱天气。而至冬季由于太阳角降低,辐射能量降低,气温下降,峡江地区被西风环流控制,盛行大陆性气候,气温低、气候干燥、雨量少。不过,峡江地区地理环境特殊,西北有秦岭、米仓山;北有大巴山、巫山;西有邛崃山、大凉山等山脉,阻挡了寒潮入侵,使得这一地区各地气温比同纬度、同海拔的其他区域要高。总体看,峡江地区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而又四季分明,具有夏热冬暖、春早秋凉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峡江地区地处丘陵和山地,因此具有明显的“立体气候”特点。

由于峡江地区的东、西两部分在地形、地貌及气候环境上紧密联系而彼此相似,使得它们在植物区系分布上也多有相似之处。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植物有山毛榉科、樟科、榛科、槭树科、山茶科、四照花科、蔷薇科、野茉莉科、冬青科、桦木科、漆树科、省沽油科、山矾科、金缕梅科等,还有以松科、杉科、柏科为主的裸子植物,以禾本科、莎草科为主的草本植物和各种竹林、蕨类植物等。

此外,峡江地区的气候环境也存在一定地域差异,这种差异影响到了所种植的作物种类。奉节以上各县气候温暖湿润,临江地带海拔较低,可耕地面积较大,农业主要以栽培水稻、玉米、红薯、小麦为主,其次种植豆类、马铃薯、高粱,经济作物多为油茶、棉花、花生、甘蔗、烟草、榨菜,经济林木则包括油桐、乌桕、油茶、核桃、油橄榄、茶、桑,还有甜橙、红橘、柚子为主的果树。而位于巫山、巫溪和鄂西境内的峡江地区地处巫山、大巴山山系,气温较以上各县要低,且这一区域石灰岩分布较广,岩溶地貌发育,河流深切,故地形破碎,山地较多,谷坡陡峭,耕地面积小,又大都集中在海拔 1500 米以下。农作物以玉米、红薯、马铃薯、小麦、豆类为主,浅丘平坦地方则能种植少量水稻^③。

三、峡江地区的古环境状况

1993 年,蓝勇先生曾依据当时西南地区考古资料中的环境信息,提出夏商西周时期的西南地区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地表水面比现在广阔,但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四川曾有一个向干冷转换

① 参考赵济主编:《中国自然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年,223 页。

② 参考任美镔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修订第三版),商务印书馆,1999 年,226 ~ 231 页。

③ 参考金义兴、陈卓良、郑重、许天全:《长江三峡库区植被及环境考古报告》,《武汉植物学研究》1984 年第 2 卷增刊,1 ~ 83 页。

时期^①。近几年,通过对峡江地区考古发现的自然遗存尤其是动物骨骼所作研究,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古环境状况知晓的较以前更多一些了,而这正是我们系统讨论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需要首先了解的背景资料。现举几例研究成果,以资说明:

柳林溪遗址 该遗址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6000年)动物群种类有犀牛、巨獭、水牛、水鹿、华南虎、野猪、大角鹿、梅花鹿、青鱼、草鱼、羚羊、秃鹫等。这反映出了当地湿热多雨、水源丰沛、植被高大茂密,并有高山峻岭等自然景观^②。

何光嘴遗址 在该遗址夏商时期的动物群中,占比例最大的部分就是水生动物,除较多的中华鲟因无法统计个体不能参加个体比例的计算外,动物最小个体总数为261个,其中有233个个体是必须生活在水中或长期生活在水域环境中的,包括各种鱼类、蚌类、田螺以及水鹿和鸕鹚等,占动物群总数的89%。这反映出当时水域深广、水流湍急、气候温暖、植被茂密的古环境状况^③。

庙坪遗址 对庙坪遗址龙山时期和西周时期动物骨骼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两个时期的人获取的鱼及其他陆地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反映出从龙山时期到西周时期此区域的自然环境似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④。

湖北巴东罗坪遗址群 对该遗址群周代动物骨骼的研究,发现周代野生哺乳动物的骨骼中有豺,这反映出周代该地气候具有“湿热、密林、多雨生态型”的特点^⑤。

以上几例研究成果都反映出,先秦时期峡江地区的气候湿热多雨,且气候较为稳定,没有大的变化。但我们注意到,有学者通过对与峡江地区邻近的清江流域不同时期各遗址出土动物群的研究,也发现这一区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生态环境未发生大的变化,属于亚热带温暖干湿的古气候,而至东周时期气候有了较大变化,大体与现在当地的气候相当^⑥。

第二节 本书探讨的时间范畴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畴主要落在“夏商时期”。

目前无论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对于夏代始年和夏代积年的看法都存在不一致性,根据不同的推算方法,会得出不同的年代结果。且有关夏代积年的记载在不同古文献中已呈分歧之势^⑦。《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暂定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始年^⑧,这与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作为早期夏文化的看法类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邹衡先生就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文化就是夏文化,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⑨。刘绪先生则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作为夏始年可能更为合理,并指出如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① 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2期。

② 参考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著:《秭归柳林溪》,附录一《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268~292页。

③ 参考武仙竹:《秭归何光嘴》第五章“动物群”,科学出版社,2003年,129页。

④ 参考袁靖、孟华平:《庙坪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载孟华平、周国平主编:《秭归庙坪》附录一,科学出版社,2003年,304页。

⑤ 武仙竹、杨定爱:《湖北巴东罗坪遗址群动物遗骸研究报告》,《四川文物》2006年5期。

⑥ 陈全家等:《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186页。

⑦ 参看程平山:《夏代纪年考》,载《夏商周历史与考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1~19页。

⑧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纪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82页。

⑨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02~104页。

中统一用《竹书纪年》之说,则夏代起始之年为公元前1994年,接近公元前2000年,还提到根据新砦遗址发掘资料,新砦第二期应属二里头文化,时代早于二里头遗址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年代上限应接近公元前2000年^①。事实上,刘绪先生的认识从绝对年代上讲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得结果已有些接近了。

与此同时,讨论早期夏文化的年代问题还须密切关注二里头文化的¹⁴C测年进展情况。1983年,仇士华等先生分析了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32个样品的¹⁴C年代数据,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的范围内^②。“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中,通过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¹⁴C年代测定、拟合,并与考古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落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③。不过,2000年以后,仇士华等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运用高精度测年与系列样品方法,“对于考古学研究所得到的新的系列进行测年”,获得了一些新成果,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800年”^④。如果这一测年结果大体可信,则夏文化的始年还当在此以前。

以上是我们讨论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需首先了解的时间方面的背景资料。无论最终学界认定早期夏文化是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开始,还是始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根据对于峡江地区“白庙文化”和中坝文化的年代研究(详后),这两支文化的晚期当都已进入夏代无疑。为防止割裂考古学文化研究产生错误的片断性认识,我们的研究上限即从这两支文化的上限开始。同样,由于考古学文化本身的延续性,在本书研究的时间下限上,我们也是以“路家河文化”和“石地坝文化”的下限作为本书讨论的下限,从而使得本书讨论的绝对年代下限已进入西周早期或稍晚。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为何选取白庙文化和中坝文化这一时段作为我们讨论的开端?

除了上面提到的时间方面的原因外,我们还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首先,在鄂西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白庙文化处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位置,它开启了鄂西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此前存在于鄂西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城背溪文化、楠木园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庙坪类型,而这几支考古学文化均可归入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也就是说此前的鄂西峡江地区是可划入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之内的。虽然曾有学者将白庙遗存归入以石板巷子遗址为代表的石板巷子文化^⑤,或如孟华平先生那样将其归入后石家河文化^⑥,但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白庙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与渝东地区同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所体现出的一定程度的趋同性。我们看到在陶器群上,白庙文化表现出既与江汉地区存在密切联系,同时又有较大差异,尤其是从炊器系统上表露出的特征与江汉地区存在的差别更大。而相比之下,该文化与渝东地区中坝文化的联系要更为密切,尤其表现在炊器系统上,可以这样理解,没有中坝文化因素的东向传播,则不会产生白庙文化(具体讨论请见第一、三章)。所以,此时的白庙文化体现出了综合其东、西地区的文化因素又加以融合的新面貌,从此开启了鄂西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① 刘绪:《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中原文物》2001年2期。

② 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③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纪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76~77页。

④ 仇士华、张雪莲:《夏商周碳十四年代框架的再讨论》,《东方考古研究通讯》第7期。

⑤ 杨权喜:《关于鄂西六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探讨》,《考古》2001年5期。

⑥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34页。

其次,从第三章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并未产生,或者在这一时段的晚期产生,所以本书对于白庙文化及中坝文化等的讨论便可理解为在三星堆文化因素传入峡江地区前对该地区文化背景的研究,相信这对于正确理解三星堆文化因素的东向传播具有很大意义。

第二,本书的讨论止于路家河文化和石地坝文化,它们的时代下限已至西周早期甚或更晚至西周中期。为什么选取这一时段作为本书讨论的时间下限?

首先,从路家河文化和石地坝文化开始,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产生较大变动。此时鄂西峡江地区的路家河文化表现出较强的扩展势头,将其文化分布范围扩展至重庆奉节县境。并且已有学者指出陕南宝山文化的兴起与鄂西地区路家河文化密切相关^①。还有原来见于朝天嘴文化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已慢慢开始融入路家河文化之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一部分小平底罐逐渐演变为尖底杯的实例。而渝东地区的石地坝文化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对外传播势头,峡江地区的尖底器传统进入成都平原,促使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诞生。这种肇始于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上的变化,大大改变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峡江地区始终受到成都平原强烈影响的趋势,而反作用于成都平原(具体阐述见第三章)。所以,路家河文化和石地坝文化阶段峡江地区也进入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仔细研究这一时期的考古学遗存对于正确认识整个四川盆地及邻境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变迁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路家河文化之后的鄂西峡江地区出现了大致相当于西周中晚期的以秭归庙坪遗址为代表的遗存^②,其典型器物有釜、鬲、豆、罐等,表现出受到江汉地区楚文化强烈影响的倾向。已有学者将其称为夔文化^③,我们以为若以典型遗址来命名,或可称为庙坪文化。也就是说,大致从西周晚期或可早至西周中期开始,鄂西峡江地区又开始受到江汉地区的强烈影响,而至春秋中、晚期,鄂西、巫山地区已成为楚文化的完全控制区^④。渝东地区的西周中、晚期遗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巫山双堰塘遗址^⑤所出遗存为代表,一类以万州塘坊坪遗址^⑥所出遗存为代表。前者已有学者称其为双堰塘类型^⑦,出土陶器既有来自于其以东地区的鬲、豆、盆等文化因素,也有渝东地区的花边与素缘口绳纹釜、尖底器等,表现出了较大的融合性,即同时具有东西两个方向的文化特征。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进入西周中晚期以后,整个峡江地区的文化格局又有些类似于白庙文化以前的状况了^⑧,只是此时的江汉地区文化因素不仅仅满足于进入西陵峡地区,而是有逐渐“吞并”渝

①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181~183页。

② 孟华平、周国平主编:《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3年,49~145页。

③ 杨权喜:《西陵峡商周文化的初步讨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102~111页;孟华平:《夔文化的考古学证据》,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71~80页。

④ 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江汉考古》2006年1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31~6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队等:《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58~6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队等:《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80~120页。

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万州塘坊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469~495页;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等:《万州塘坊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575~591页。

⑦ 已有学者提出“巴文化双堰塘类型”,见梁中合、贾笑冰、赵春青:《巫山双堰塘遗址考古发现典型西周陶窑》,《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第3版。

⑧ 关于楚文化西进方面的问题,可以参看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江汉考古》2006年1期;余静:《从近年来三峡考古新发现看楚文化的西渐》,《江汉考古》2005年1期。

东地区的趋势。相当于战国中期阶段，在忠县崖脚墓地发现迄今为止分布于峡江地区最西端的楚墓，并与湖北江陵楚国都城一带的楚墓从墓形、棺槨、器物组合及器形都基本一致^①，这便是最好的说明。

简言之，我们选取的时间范围恰恰涉及了三星堆文化因素东向传播前峡江地区的文化背景，三星堆文化时期峡江地区吸收融合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状况，石地坝文化、路家河文化西向的强势传播及其与三星堆文化的消亡和十二桥文化的兴起之间的关系，直至三星堆文化结束后，峡江地区残留的三星堆文化因素一步步融合消失于当地考古学文化中的全过程。可以把这条主线作为本书讨论的另一个时间轴。

第三节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简史

峡江地区已开展的考古工作情况学者多有回顾和总结^②，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峡江地区考古研究与研究的具体情况，我们以为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许能够更好地表述这一地区先秦时期尤其是夏商时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历程。

一、早期的调查和发掘（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

（一）外国人的调查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30 年代）

这一阶段的相关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重庆境内。1886 年英人贝巴（C. F. Baber）入川游历，在重庆附近购得磨制石器二枚。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美国自然博物馆中亚探险考古队的纳尔逊（N. C. Nelson）等人曾于三峡地区发现若干古文化遗址。据郑德坤先生介绍：

“奈尔逊氏在长江两岸调查极详，得史前遗址三十七处。此批遗址所得石器，其共存情形可分为四阶段，或可代表四时期之遗物。

第一期 遗址五处，只有第一类打制石器发现；

第二期 遗址亦五处，其中只得第二类打磨石器者一，而得打制及打磨石器共存者四；

第三期 遗址六处，其中得打制石器与打琢磨石器共存者三，得打制、打磨及打琢磨三类石器共存者亦三；

第四期 遗址二十一处，其中得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者六，得打制、打磨与磨制石器共存者三，得四类石器共存者九，而只得磨制石器者三。

奈尔逊氏所得遗址，发现陶片者凡十二，而此十二处遗址，均属第四期产物。据此可知四川陶器与第四类磨制石器有密切关系，且可证磨制石器为四川史前石器工业最新近之出品。”^③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科学出版社，2003 年，679~730 页。

② 较多学者在文章中提到过，如孙华：《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 年，117~118 页；陈振裕、王凤竹：《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2003 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17~29 页；孟华平：《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存分析》，《2003 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66~67 页；王宏、余介方、金国林：《浅论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及其变迁》，《重庆·2001 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144 页；杨华：《长江三峡地区文物考古的回顾与展望》，《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 1 期；徐光冀：《永不失落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前言》，山东画报社，2003 年，1~9 页。

③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巴蜀书社，2004 年，1~11 页。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H. Edgar)在四川进行考古调查时,也于三峡地区采集到一些石器^①。

峡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后,仍然存在许多石器,包括较多的打制石器,所以以上的调查地点有的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由于未见调查所得实物,此处也无法作出进一步推测。

(二) 中国考古工作者所作的调查和试掘工作阶段 (20 世纪 50 ~ 70 年代)

这一阶段在重庆和湖北境内都开展了一些工作。

1. 渝东峡江地区

1957 年 3 月,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为了配合当时工农业大生产,做好文物保护宣传工作,曾派出川东调查小组,沿长江两岸的长寿、涪陵以下至巫山 8 个县,进行调查。发现了忠县谿井沟和巫山大昌镇两处遗址,面积较大,有明显的文化层和大量遗物。又发现地面遗有石器或陶片的地点 29 处^②。据调查者介绍,“在这些遗址中,皆发现有波浪式口沿和敛颈大腹夹粗砂绳纹陶器残片”。从发表的忠县谿井沟和巫山调查陶器看,均已进入商周时期。1958 年 10 月,为了配合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工程,由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合作组成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队,调查的范围是长江沿岸及其支流的两岸。这是四川省内一次规模较大的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调查后,“需要处理的遗址”中包括“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遗址 36 处”^③。1959 年 7 ~ 8 月,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与四川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生产实习的同学在忠县谿井沟遗址进行试掘,发现的陶器有尖底杯、陶釜等,还发现一件双翼铜镞^④。

2. 鄂西峡江地区

1958 年 10 月、11 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派人在湖北宜昌、秭归、兴山及巴东四县共调查到“新石器时代”遗址 4 处,周代遗址 1 处及遗物采集点 25 处,包括的遗址点有秭归鲢鱼山等^⑤。1960 年 4 ~ 7 月,在 1958 年长江工作队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长江西陵峡及附近部分地区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这次共复查遗址点 27 处,调查 15 处,试掘 1 处。调查者将遗址分为五类,并认为第一类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第二类似相当于中原西周或稍早;第三类和第四类相当于中原地区东周时期,它们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了;第五类属汉代遗址^⑥。1958 年和 1960 年这两次调查与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为三峡工程兴建后进行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好准备。20 世纪 60 ~ 80 年代初,长江水利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组织湖北、四川两省文物部门,对整个三峡地区进行了数次全面的和专题性的文物考古调查。为配合葛洲坝工程建设,20 世纪 70 ~ 80 年代初,湖北省文化厅组织省内的考古力量对葛洲坝工程范围进行一系列考古工作^⑦。

① 王川平、刘豫川:《前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科学出版社,1 页。

②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 年 8 期。

③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 年 8 期。

④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谿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 年 8 期。

⑤ 杨锡璋:《长江中游湖北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0 年 10 期。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 年 5 期。

⑦ 林春:《长江三峡大坝施工区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人民长江》1999 年 11 期。

这一阶段鄂西峡江地区经发掘的有白庙（1979年，此处年份指进行考古发掘的年份，下同）^①、中堡岛（1979）^②等遗址。

以上的工作还有起步阶段的特点，通过调查和小规模发掘，人们已经认识到峡江地区存在面貌独特的考古学文化，不过，在年代方面的认识多有模糊之处。当然，由于已发现的材料过少，也就缺少对比资料，还不能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

二、峡江地区先秦时期遗址发掘增多与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建立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期）

（一）田野工作概况

这一阶段开展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也可分为两个小阶段：

1. 1992年以前

（1）鄂西峡江地区

这一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而展开。1979年4月至1984年4月，宜昌地区博物馆3次在香溪河下游进行过考古调查，共发现15个文物点，其中古遗址9处^③。1982年，宜昌地区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当阳、枝江、宜都、秭归等县进行认真的文物普查和初步试掘，发现夏（4处）、商（3处）、西周（13处）时期文化遗存20处^④。由于仅为简短的报道，具体地点不知。1984~1986年，是长江三峡工程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主要在西陵峡段进行。1984年，为配合长江三峡水库的建设工程，在西陵峡东段太平溪镇至三斗坪镇的峡谷两岸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址，其中有路家河、中堡岛、上磨埡、小溪口、西湾等^⑤。

这期间进行考古发掘的遗址有宜昌白庙（1981、1985~1986）^⑥、路家河（1982、1983、1984）^⑦、中堡岛（1985~1986）^⑧、杨家嘴（1985）^⑨、三斗坪（1985~1986）^⑩、莽麦岭（1985）^⑪、

① 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宜昌白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5期。

②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1期。

③ 宜昌地区博物馆：《香溪河古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1期。

④ 任广耀：《宜昌地区发现夏商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多处》，《江汉考古》1982年2期。

⑤ 杨权喜、陈振裕：《长江西陵峡北岸的几处商周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185~187页。

⑥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白庙子遗址第二次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2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1986年宜昌白庙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6年3期。

⑦ 具体发掘材料见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宜昌路家河》，科学出版社，2002年，1~141页。

⑧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2期；张之恒：《秭归县中堡岛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160页。

⑨ 李天元：《宜昌县杨家嘴早商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163页。

⑩ 陈振裕、杨权喜：《宜昌县三斗坪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科学出版社，1988年，161页；杨权喜、陈振裕：《宜昌县三斗坪大溪文化与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198页。

⑪ 梁柱：《宜昌莽麦岭新石器时代及商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159页。

白狮湾(1986)^①、秭归朝天嘴(1985~1986)^②、银街(1985)、杨泗庙(1985)^③等。

另在清江流域为配合隔河岩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建设,发掘了长阳香炉石(1987、1988、1989)、深潭湾(1989~1990)^④等遗址。

(2) 渝东峡江地区

1980年10月,重庆市博物馆对重庆市属长江河段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2处,另有石器采集点14处^⑤。这些遗址中包括有涪陵镇安、蔺市等,均被调查者归入新石器时代。1985年11~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对巫山境内长江、大宁河两岸古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新石器时代遗址8处,商周遗址14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11月15日,大昌九公公社光明二队社员王成荣在东坝附近涉水渡大宁河时,在岸边水中发现一件商代青铜尊^⑥。1987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为进一步了解川东地区史前文化遗存的分布及其特征,在万县地区,重点是大宁河流域和长江沿岸的部分遗址,调查的地点有22处。此次在忠县簪井乡发现的“中坝子遗址”采集到有中坝文化特征的花边缸^⑦。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坝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5米×5米探方3个^⑧。

2. 1992年以后

1992年以后,随着兴建长江三峡水库的决议被通过,这一阶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并为下一阶段的整个峡江地区有史以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发掘做好了准备工作。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有关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为了彻底了解和掌握三峡库区的文物状况,在国家文物局的安排部署下,湖北、四川、重庆两省一市文物部门组织了大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库区进行调查,共记录海拔177米以下文物点495处,其中地下文物238处^⑨。1994年12月至1995年7月,在国家文物局的规划和组织下,全国三十余家文物考古、古建、人类学等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五百余名科研人员,为完成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进入三峡地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复查、调查和试掘工作。这次复查和调查共记录文物点1282处^⑩。其中1992年、1993年、1994年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次对丰都县三峡工程淹没区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复

① 陈振裕、杨权喜:《宜昌县白狮湾新石器时代至东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199~200页。

②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2期。

③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三峡坝区前期准备工作中的考古发掘初见成果》,《江汉考古》1986年1期。

④ 王善才:《清江流域隔河岩工程库区二十五座古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198页;王善才:《清江流域隔河岩工程区商周遗址与崖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273~274页。

⑤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长江河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2年12期。

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巫山境内长江、大宁河流域古遗址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1~10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314~321页,简报图四,1号器物。

⑧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272页。

⑨ 王川平、刘豫川:《前言》,载《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ii页。

⑩ 陈振裕、王凤竹:《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提到是1281处;王川平、刘豫川:《前言》,载《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ii、iii页。